

毛泽东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夏海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认为既要继承，又要扬弃，更要创新发展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系指传统社会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两翼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传统。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传统文化大家。在他的数万册藏书中，收有大量经、史、子、集线装古籍。其中最爱读的历史书籍占有很大比重，既有正史又有野史稗史，既藏有上古史《尚书》《春秋》《左传》以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又藏有明清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以及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等著作，还藏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对于传统文化典籍，毛泽东不是收藏而已，而是认真阅读，汲取知识智慧，用以指导革命实践。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对于他认为重要或欣赏的地方，常常画有直线、曲线、有的有句末、句旁加以圈点；需要着重强调的地方，画有双直线、直线加曲线，双圈、大圈套小圈；对于他不同意的地方，则画有三角、叉等记号。毛泽东阅读古籍常有批注，喜欢的书籍就会写上“好”或“略好”的评语。有的批注则联系实际，写上几百乃至上千字，或赞或叹，或争论或批驳，纵横捭阖，极具本色。

毛泽东最喜欢史书，阅读次数最多的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为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以时间为纲的编年体史书，有别于司马迁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史记》，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和安危之道，以便作为历史借鉴，警示后人。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资治通鉴》之名。全书按朝代分为16纪，共294卷，约300多万字，毛泽东一生读了17遍，认为“这部书写得好”；“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喜读《二十四史》，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二十四史》由《史记》《明史》等24部史书组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明朝崇祯十七年，记载了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有3200多卷，约4000万字，毛泽东通读了一遍。其中读得最多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有的史册、篇章还读了二遍、三遍和四遍。《晋书》有几册封面上分别写道：“一九七五，八”；“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毛泽东不仅通读《二十四史》，而且写出了许多评论，认为“《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毛泽东不仅评论整部史书，而且评价史书中的某些篇章，认为《新唐书》中的《严郢传》“写得不错”；《吴通玄传》“写得好”。对于《前汉书》《后汉书》，认为“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毛泽东深爱着中华民族，历史知识渊博，文化根基厚实，因而对传统文化有着全面而正确的认识。最基本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毛泽东看来，传统文化是先秦以来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在中国人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近代以来，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产生了半封建文化。无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都要坚决反对半封建文化，而对于传统文化则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首先，要继承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充分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党要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继承的前提是学习，读懂弄通传统文化。毛泽东从小就学习传统文化，“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在以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传统文化典籍居则在席，行

则在囊，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继承更重要的是运用，毛泽东是运用传统文化的典范。学界研究认为，毛泽东的著作拥有大量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哲学层面引用最多是孔子的言论及儒家的著述。无论是以史为鉴，还是摘取零碎的历史和语言资料，毛泽东运用传统文化都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沉淀于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之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简明运用传统文化，充分论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意义，“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民族而死，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即使今天读来，敬佩之情仍会油然而生。

其次，要扬弃传统文化。毛泽东尊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却认为“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传统文化确是博大精深，但既有精华又有糟粕，需要继承的是精华，而不是糟粕，“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继承传统文化只能是扬弃，即批判地继承，也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由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和儒家思想，更多地采取了批判的态度。1939年12月，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不是否定孔子，更不是否定传统文化。他1955年在一个按语写道：“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少年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毛泽东扬弃传统文化，较多表现为发挥“评论员”的作用，即对传统文化典籍有自己的看法，有所评论，而不是亦步亦趋。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皇帝，贬多褒少，毛泽东却从中华民族统一大业角度给予高度评价。1970年6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

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字有两说：一个叫瓷器，一个没有A字，就是CHIN（秦朝）。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可骂得厉害”。还专门写了一批批孔颂秦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说文王》（《读〈封建论〉呈郭老》）。

再次，要创新发展传统文化。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无论古为今用，还是推陈出新，都是要求创新发展传统文化，为现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服务，“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指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即使“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创新发展必然要求批判改造传统文化，“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如仁勇的范畴应理解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的，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毛泽东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更大手笔，就是以现代中国为主体，在中西“结合”上做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学于古而不泥于古，取于西而不迷于西，进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在20世纪以来的昆曲兴衰史上，北京大学具有较为重要的位置。1917年，曲学大师吴梅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传授昆曲，是高校昆曲教育的起始。经由这一脉络，北京大学等高校成为昆曲传承的重要场所。它就像一个蓄水池，不仅培养了众多高素质的昆曲观众，而且是昆曲清曲传承的主要力量。百年来，北京大学的昆曲传习薪火相传，2014年，北京大学成立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并在2018年成为教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近年来，北京大学拓展以昆曲、古琴为主的“非遗”教育与校园美育，以《经典昆曲欣赏》《戏曲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通选课程为核心，让学生们近距离体验与欣赏“昆曲之美”，并组织校园传承版《牡丹亭》，通过学生跨界演出大戏来深化昆曲传承。此外，还开展昆曲的跨学科融合与跨文化交流，不仅在开罗大学开设“中文+昆曲/古琴”课程，而且到西班牙、埃及、卢森堡等国家举行昆曲古琴演出和工作坊，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昆曲不仅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密码”，而且可以与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相结合，这既是昆曲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主任）

的，就是那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字有两说：一个叫瓷器，一个没有A字，就是CHIN（秦朝）。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可骂得厉害”。还专门写了一批批孔颂秦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说文王》（《读〈封建论〉呈郭老》）。

再次，要创新发展传统文化。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无论古为今用，还是推陈出新，都是要求创新发展传统文化，为现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服务，“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指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即使“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创新发展必然要求批判改造传统文化，“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如仁勇的范畴应理解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的，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毛泽东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更大手笔，就是以现代中国为主体，在中西“结合”上做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学于古而不泥于古，取于西而不迷于西，进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在20世纪以来的昆曲兴衰史上，北京大学具有较为重要的位置。1917年，曲学大师吴梅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传授昆曲，是高校昆曲教育的起始。经由这一脉络，北京大学等高校成为昆曲传承的重要场所。它就像一个蓄水池，不仅培养了众多高素质的昆曲观众，而且是昆曲清曲传承的主要力量。百年来，北京大学的昆曲传习薪火相传，2014年，北京大学成立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并在2018年成为教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近年来，北京大学拓展以昆曲、古琴为主的“非遗”教育与校园美育，以《经典昆曲欣赏》《戏曲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通选课程为核心，让学生们近距离体验与欣赏“昆曲之美”，并组织校园传承版《牡丹亭》，通过学生跨界演出大戏来深化昆曲传承。此外，还开展昆曲的跨学科融合与跨文化交流，不仅在开罗大学开设“中文+昆曲/古琴”课程，而且到西班牙、埃及、卢森堡等国家举行昆曲古琴演出和工作坊，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昆曲不仅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密码”，而且可以与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相结合，这既是昆曲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主任）

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本报记者 杨雪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大一统思想如何孕育、发展、历久弥坚？各民族何以团结融合，多元如何聚为一体？如何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近日，由国家民委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对外展出。展览以1500余件文物古籍，向观众展开了一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画卷。

展览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力求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自觉增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展览分为“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个单元。“大一统”单元从思想理念、制度实践、价值追求三个维度发展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基因；“大交融”单元从文化上的兼收并

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三个方面展现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壮大的脉络和凝聚不散的历史密码；“大团结”单元展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深邃思想与丰富实践。

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是国家民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展览旨在让观众深刻领会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密切联系，充分认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同时更好发挥文物古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叙事体系、话语体系，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发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据悉，展览将面向社会公众长期开放。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3》：

探索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本报记者 谢颖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3》发布会暨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学术研讨会。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3》是该系列的第8份年度报告，包括1个主报告，以及综合篇、经济篇、社会篇、生态环境篇等4篇17个专题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迫切需要改革添动力、增活力。随着经济形势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在农业强国建设目标下，我国进入了新一轮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新时期。

《报告》认为，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需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把住粮食安全、农民利益等底线红线，继续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瞄准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明确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任务。新阶段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确立新目标，即建立与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相适应，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特征，能够引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体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等发展导向的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分阶段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的制度体系。

《报告》指出，未来五年，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领域是创新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乡村振兴要素投入保障机制、农民持续增收致富保障机制、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同时建立完善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政策体系。

鉴古知今，感受中华文化创造力

本报记者 张丽

8月8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旗下青少年图书品牌“神秘岛”在北京大有书店举行《战争里的中国史》新书发布会。该书从上古黄帝蚩尤的传说开始，一直到清朝巩固统一的三征噶尔丹，讲解了中国历史关键节点上的20场重要战争，从战争的视角梳理出清晰、丰富、生动鲜活的中国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徐根初表示，中国在冷兵器时代就涌现出十分丰富的兵家典籍，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都是罕见的。战争谋略的运用，在中国早期战争实践中就具备了一定高度。这些谋略深刻地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蕴藏于骨子里的战争智慧。

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认为，只有学习

自己国家的历史，认识自己民族的英雄，感受我们文化的吸引力、创造力，才能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才能创造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战争里的中国史》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宏大的中华文明概览，以精彩扎实的内容为青少年读者的历史普及开辟了新的有益的方向。

与会者认为，今天我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只有学习研究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才会懂得珍惜和平的可贵；只有居安思危，惕厉自省，才能更好地守卫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不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相信这套书能给青少年读者带来精神上的鼓舞和启迪，帮助他们从小培养起热爱和平的精神、不惧挑战的勇气，自信地迎接复杂多变的未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探析媒体内容生产方式创新的边界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日前，2023中国新媒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在内容创新论坛上，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陆先高认为，内容生产方式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是有约束的，是有边界的。

陆先高以光明图片为例谈道，随着媒体融合发展步伐的加快，图片在内容生产和传播中的使用数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伴随图片版权纠纷而来的问题也扑面而来。为了解决图片生产问题，光明日报搭建了光明图片库《戏曲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通选课程为核心，让学生们近距离体验与欣赏“昆曲之美”，并组织校园传承版《牡丹亭》，通过学生跨界演出大戏来深化昆曲传承。此外，还开展昆曲的跨学科融合与跨文化交流，不仅在开罗大学开设“中文+昆曲/古琴”课程，而且到西班牙、埃及、卢森堡等国家举行昆曲古琴演出和工作坊，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昆曲不仅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密码”，而且可以与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相结合，这既是昆曲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主任）

起奔小康”报道、“百年奋斗 百年答卷——庆祝建党100周年新闻摄影展”等，还能向社会提供图片相关服务，比如曾连续6年承担北京国际摄影周主题展板内容组织工作，其中包括2020年打造的北京国际摄影周“中国抗疫新闻摄影展”等。

陆先高认为，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是媒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作为机构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是在先进性、科学性的基础上，有约束和规则，包括内容把关、编辑选优、互动管控、舆情应对等生产全流程，都必须做到可控。

陆先高表示，自2012年以来，光明新闻图片库的品牌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不仅能服务新闻重大主题宣传，比如“建党百年‘七一’特刊”“56个民族一

从昆曲探寻中华文明的“密码”

陈均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论述对观察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变化及特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与方法，昆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最为典型的艺术之一，其产生、发展与传承恰好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昆曲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造性与包容性的产物。昆曲产生于晚明，极盛于盛清，衰落于20世纪初期。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处于“早期现代时期”，昆曲是中国这一时期的艺术结晶与文化象征，容纳了中华文明发展到明代的诸多文化艺术领域的优秀成果。譬如昆曲文学，包括杂剧、传奇与诗词散曲等，是中国的诗学传统在明清时期的更新，也是诗与小说、戏剧的结合；昆曲音乐包括南北曲，以中州韵为标准，用工尺谱来记录。清代乾隆十一年编纂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82卷，包括4466个曲牌，是对中国古典音乐的一次集大成的总结；昆曲的表演艺术继承了宋元杂剧戏文的形式，又进行了精细化与精致化，形成“江湖十二脚色”的行当艺术；昆曲美术结合了明清时代的物质文化，又成为其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阅刻《西厢



北大校园传承版《牡丹亭》剧照

记》彩色套印图，共21幅，被认为是明代艺术史的高峰之作。昆曲就像一个倒三角形，将中华文明的诸多方面汇聚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演变成昆曲艺术。

二十世纪初，昆曲从宫廷艺术变为民间艺术，继而被视为古典艺术，开始走向衰微。此后经历了三次复兴：第一次是1917年前后，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知识阶层、部分商人和梅兰芳、杨小楼等名伶，与北方昆弋班社合流，在北京掀起昆曲复兴运动。稍后江浙沪的知识阶层、商人与士绅在苏州创办昆剧传习所，昆曲因此得以延续半个世纪。第二次是

